

沈衍庆与清晚期江西乡村社会治理

陈海斌^{1,2}

(1.赣南师范大学 王阳明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沈衍庆历任江西兴国、泰和、安义及鄱阳知县,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开展了广泛的乡村社会治理。沈氏清刑狱,催征赋税,推行保甲、乡约,防治盗贼,维护乡村社会治安。其任鄱阳知县期间,遭遇两次严重水灾,对乡村社会造成了深重灾难。为有效应对水灾,开展社会救济,沈氏多次向朝廷请求赈济、减免赋税,发放抚恤钱粮赈济灾民,施粥施衣。同时,实施“缓征与捐输并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帮助灾民顺利渡过危机。沈氏在乡村社会的水灾救济和治理中特别注重绅耆阶层的作用,以绅耆为沟通官民的中介,并极力帮助灾民重修堤圩以恢复生产。沈氏所处之道光、咸丰年间,社会变迁剧烈,内忧外患,故其还必须应对来自外部侵袭的威胁。为保境安民,沈氏积极响应督抚号召组织兴办团练,以保甲和乡约相结合的方法训练乡勇抵御太平军,其本人也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不幸殒身,成为地方知县当中抗击太平军的“典范”。沈衍庆在江西的乡村社会治理,不仅凸显地域性,还反映出其时清代社会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当今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沈衍庆;清晚期;江西;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5-0111-14

Shen Yanqing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EN Haibin^{1,2}

(1. Research Center for Wang Yangming,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2.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Shen Yanqing served as the magistrate of Taihe, Xingguo, Anyi and Poyang in Jiangxi province, and carried out social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problems when he faced. Shen Yanqing cleared the prison, urged the collection of taxes, implemented Baojia (保甲) and Xiangyue (乡约),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thieves, and maintained rural social security.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Supervisor of the County of Poyang, he encountered two serious floods, which caused serious disasters to the rural socie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flood and carry out social relief, Shen Yanqing had repeatedly requested the Imperial Court for relief, tax relief, pension, food relief, Congee and cloth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ethods of "delaying conscription and donating" and "using work as a means of relief" will help disaster victims overcome the crisis smoothly. During the Daoguang and Xianfeng years when Shen Yanqing lived, the social change was fierce,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so he had to deal with the threat from

[收稿日期] 2022-11-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江西地方司法文献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1CZS069);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江西地方健讼问题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0LS10);第7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22M722005)

[作者简介] 陈海斌(1986-),男,历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王阳明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治理研究。

external invas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people, Shen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governor's call to organize group exercises and trained the villagers to resist the Taiping Arm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Baojia and Xiangyue. He unfortunately died in the battle with the Taiping Army. As a local "parent official", Shen Yanqing upholds th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cherishes the people,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hen Yanqing's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Jiangxi not only highligh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reflects the universal problems that existed in Qing Dynasty society at that time,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oday.

Key words: Shen Yanqing; Late Qing Dynasty; Jiangxi; Rural Governance

“郡县治,天下安。”县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实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清代,县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一级,知县是一县事务的实际执掌者,一县之事无不关乎知县,在地方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知县与乡村社会治理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随着司法档案、知县日记、年谱等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与整理,对于清代知县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从以往的法律史视角转变为从司法与行政互动的视角,深入到地域社会的细部,考察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与地方治理^①。本文的研究对象沈衍庆,生活于道光、咸丰年间,历任江西地方知县。其时,清代社会已进入衰落期,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地方盗贼丛生,赋役繁重,而太平军又对清王朝予沉重打击。沈氏在江西地方知县任内所开展之社会治理,既是地域性的社会问题,又是其时全国性的、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基于此,本文拟从沈衍庆在江西地方知县任内的施政入手,考察其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及其对于当今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

一、沈衍庆生平与仕宦经历

沈衍庆(1813—1853),字字符,号槐卿,安徽池州石埭县人。幼年天资聪颖,七岁便能吟诗作文。十三岁入郡庠读书,十九岁考中举人,二十岁中进士,被授予江西地方知县官职。其父祖在乡里皆有美名,“曾祖成美居乡,善排解,世称善人。祖赉颉,性刚直,平日不与人竞事,关名教必争之。乡中筑堤、修祠、建水口塔,皆以身任之,人怀其德。父作舟事,继母称孝,与弟士翔敬爱,爨分复合。祖父皆邑庠,以覃恩赠奉政大夫。”^②从中可见其家风之优良,其父祖皆秉承儒家伦理,热心于乡里公共事务。沈氏幼年时期受到了祖父的深刻影响,其在怀念祖父的文章中有过自述:

忆衍庆周晬后,牙牙学语,稍识之无,祖父色喜,论先父辞远村馆,就前堂设帐,祖父手录《三字经》《唐诗》诸卷授读。四五岁时稍解字义,祖父逐日为讲《阴鹭文图注》,欲使通《字说》,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年;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与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张研:《清代县级政权控制乡村社会的具体考察——以同治年间广宁知县杜凤治日记为中心》,大象出版社,2011年;邱捷:《晚清官场镜像 杜凤治日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等等。关于州县官与清代江西地方社会治理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较少。参见陈佳佳:《凌燾与清中叶江西地方社会治理——以〈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秦雪莹:《清中叶江西地方社会问题及治理——以〈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而关于沈衍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槐卿判牍》,以及其与司法审判的研究,考察其乡村社会治理的研究则鲜有。参见龚汝富:《沈衍庆及其〈槐卿政绩〉浅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余小芬:《沈衍庆〈槐卿遗稿〉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肖燕:《清代家庭经济纠纷的诉讼解决》,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马德婷:《〈槐卿政迹〉中细故疑案的审断》,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高凌燕:《〈槐卿政绩〉所见清代地方司法裁判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②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清]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3页,同治元年刊本。

兼学善果也。祖父经理族中大小诸务,旁午特甚,饭后灯前犹必课背所读书。暇辄令诸孙随侍,举古今人物成败得失,忠臣烈士,仁人孝子,可歌可泣之事,一一称述,而嘉叹之。^①

沈衍庆初为官时,祖父赐给他一对联,“人于方寸存清白,官在朝廷任去留”^②,沈氏将之悬挂于书室中,时常观看并自省,以此警示自己不要贪恋功名,而要清白做人。祖父的谆谆教导无疑对沈衍庆的成长及为官从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沈衍庆自幼便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为官后特别推崇康熙时期理学名臣陆陇其之为人,常读其书,并以之为楷模^③。

从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以知县分发江西,沈衍庆便开始了江西地方知县的为官生涯。道光十七年(1837),代理金溪知县四十二日,便卓有政声。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署理兴国知县。道光二十二年(1842)服阙,九月署安义,政声如兴国。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补泰和。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叙加同知衔。其时,适逢鄱阳知县缺出,在南昌知府王藩的举荐下,于四月调任鄱阳知县^④。咸丰元年(1851)以卓异政绩入觐皇帝,再次回任鄱阳知县。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围攻鄱阳县城,沈氏率军驰援,与代理知县李仁元共同奋勇迎敌,由于寡不敌众,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时年四十一岁。其事迹载入《清史稿·忠义传》。著述有《槐卿遗稿》六卷、《槐卿政绩》六卷、《团练乡守备要》十一卷。

沈衍庆历任江西地方知县,所至多有政绩,官声卓著,受到南昌知府王藩的赞誉,称其为“循吏也而兼能吏”,并被誉为“江西第一循吏”^⑤。沈氏具有高超的理断案能力,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如同治《安义县志》称其“秉性刚介,除莠安良,执法尚严,豪强者多畏之。审讼毕,堂断涉笔即成。”^⑥民国《安徽通志稿》评价其“以经术饰吏治,泛应曲当,所至有神明之称。迄今得其谥判而读之,事无大小咸准情酌理,洞烛幽微,能使屈者伸、黠者伏,人人皆革面而悔心,非忠信之积于素乌,能临事明决。”^⑦认为沈衍庆以经术为治政之本,审案以法为主,并融合情与理,注重道德教化,突出地展现其作为循吏之形象。缪荃孙《续碑传集》的评价则与之相似,称其“锐意有为,尤善折狱,每以小几对簿,准情度理,众心洽然。”^⑧而对于沈衍庆的为政及为人,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按察使的桂超万盛赞其“豫章治行无双,广阳人物无双”^⑨。从以上可以看到,沈衍庆虽然只是知县一级的下层官吏,但对其评价却颇高,而这与其突出的政绩是密切关联的。

沈氏恪尽职守,秉公施政,忠实履行作为地方“父母官”的职责。清刑狱,完赋税,治水患,济贫民,捕盗贼,创育婴堂,建书院,兴学校,开展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沈衍庆在江西地方知县任内的施政,与其他知县一样,都普遍关注刑名、钱粮、社会治安等事关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方面。然而,其又结合当时地域的特殊性,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同时,沈氏所处时代又给其社会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并赋予其独特的时代内涵。

二、刑名、钱粮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

刑名和钱粮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知县治理地方的重要职责。诉讼繁多,赋税积欠严

① [清]沈衍庆:《祭先大父文》,载其著《槐卿遗稿》卷6《杂著》,第251-252页。

②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3页。

③ [清]钱仪吉、缪荃孙、闵尔昌等:《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2页。

④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90-291页。

⑤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5页。

⑥ [清]杜林修、彭斗山纂,同治《安义县志》卷6《职官志》,同治十年刊本。

⑦ 安徽通志馆辑:《安徽通志稿》之《安徽通志艺文考·子部七·法家类》,1934年铅印本。

⑧ [清]缪荃孙:《续碑传集》卷61《忠节八》,宣统二年江苏编译局刻本。

⑨ [清]桂超万:《序》,沈衍庆:《槐卿遗稿》,第5页。

重,这是沈衍庆任知县时江西乡村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沈氏任知县的兴国、泰和及鄱阳,长期以来便是官员眼中的难治之区,健讼风气炽盛。民谚有云,“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所说的就是江西的讼风之盛,而其中又以筠州、袁州、赣州、吉安为盛。自北宋以来,江西就素有好讼的风潮^①。及至清代,江西地方健讼之风依然炽盛^②。如沈氏任职时的鄱阳县,“民情好讼,睚眦微嫌,往往饰词架控,连期催读,致案牍纷纭。”^③同时,江西地方又是赋税拖欠极为严重之区,如泰和县“其俗以抗粮为能,历年多积欠”^④;鄱阳县也是“钱粮款项繁多,征比易紊,胥役藏隐射之奸,小民受追求之累,妨民病国莫此为甚”^⑤,有关赋税钱粮之案纷繁^⑥。在兴国、安义、泰和及鄱阳知县任上,沈衍庆清理积牍,举凡山林、田土、婚姻、钱债、命案、盗葬、税粮等民事、刑事纠纷与诉讼,无不涉及,有力地遏制了治域内的健讼风气,使地方刑狱清明。如其“调补鄱阳,戢吏役,锄豪强,听讼敏决,积牍一清。”^⑦在审理诉讼之外,沈衍庆积极劝导百姓及时完纳国课,弥补积年之逋欠。由于江西地方独特的区域历史和民情风俗,刑名和钱粮问题尤为突出,成为沈氏施政极为关注的重点问题。

道光十八年(1838)三月,沈衍庆25岁,出任兴国知县。兴国地处万山之中,民风强悍,被视为难治之区。沈衍庆在为兴国宝贤书院所作之《记》中便指出:“兴以蕞尔,邑界万山中,民习强悍,挟气尚斗,闾巷之间酒食游戏相征逐,攘窃奸宄往往竞起,风俗之不正,教化之不行。”^⑧当沈衍庆到兴国上任时,人们看到他如此年轻,对其能否胜任知县之职还持怀疑态度。然而,年轻的沈氏却表现出卓越的施政才能。“及莅事,兴利除害,摘奸抉覆,虽老吏不逮也。”^⑨其时,兴国县有一猾衿,奸险善辩,衙门公事多被其把持操控,沈衍庆“因事痛责”,使这一猾衿认识到自己的羞耻行为而“敛迹不出”^⑩。沈氏在兴国清理刑狱,表现出极强的断案能力。

当沈衍庆莅任之初,便有萧姓争继案控告到赣州府,其时提讯批文已发至兴国县衙。在人证即将解捕到府衙之前,沈衍庆劝谕诉讼两造:“案奉府提,县未便讯,但上府日久费多。吾忝为民牧,痛痒相关,甚为惜之。意欲就近一讯,服则详销,否则送府,可乎?”^⑪试图将案件就近审讯完结,避免到府城审理而迁延费时。在其劝谕下,“两造皆叩头求讯判,以孤子礼不为后,以无生父命之。又别无应继之人,应援无子祿食之例,以田租百石,一半永存祭产,则不继而自不绝,其一半分给周亲。”^⑫此案涉及宗族祭产问题,沈氏在处断时充分考虑情、理与法的关系,尽可能地照顾到诉讼两造的利益,成功地将案件在进入赣州府衙司法程序之前审结,避免了到赣州府进行诉讼的波折。沈氏成功处断此案,“于是一邑服其明,数

① 关于宋代江西民风好讼的研究较多,可参见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施由明:《宋代江西的好讼之风》,《文史知识》2008年第11期;方志远:《明清江南“好讼”成风》,《小康》2004年第10期;等等。

② 参见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0-206页。

③ [清]沈衍庆:《水灾谕息讼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76页。

④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5页。

⑤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名宦》,同治十年刻本。

⑥ 关于清代江西赋税纠纷与诉讼纷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已有详细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参见龚汝富:《清代江西赋税纠纷案浅析》,《历史档案》2005年第3期。

⑦ [清]朱寿朋撰:《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9,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

⑧ [清]崔国榜修,金益谦纂,同治《兴国县志》卷41《艺文》,同治十一年刻本。

⑨ [清]崔国榜修,金益谦纂,同治《兴国县志》卷22《名宦》,同治十一年刻本。

⑩ [清]崔国榜修,金益谦纂,同治《兴国县志》卷22《名宦》,同治十一年刻本。

⑪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4页。

⑫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4页。

月问结三百余案”^①。其时,兴国县有土棍陈清璜、钟延奎等人借连年歉收之名禁止商贩运送粮食出境售卖,并对往来客货运货船抽取厘税。若有违抗者便倾覆其船,使往来客商苦不堪言。沈衍庆获悉此事后迅速查明实情,亲率衙役将这批违法之徒缉拿。针对兴国县内讼师“以人命为奇货,旋控旋即贿”^②的状况,沈氏对之严厉惩治,打击唆讼之讼师,并发布告示严禁唆讼。

沈氏在兴国任职九月,秉公施政,“饮冰自矢,不名一钱”^③,能力出众。桂超万对此高度评价,“及谈治兴国事,引经断狱,誓服豪强,虽老吏不及。”^④为切实了解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沈氏“徒步赴乡询民疾苦,从善若流,嫉恶如仇。不逾年,官民如父子。”^⑤当其离任之时,远近百姓遮道跪立欢送。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沈衍庆补任泰和知县。泰和地方,健讼之风盛行,民间钱粮积欠问题严重,给地方治理带来极大困难。沈衍庆在向上司吉安知府文海汇报泰和地方情形时指出,“泰邑界连五县,水陆冲途,狱讼纷繁,治理非易。”^⑥在沈氏看来,泰和县诉讼纷繁、民情疲敝与钱粮积欠密切关联,两者相互交织、相互缠绕,成为地方治理的难点所在。同时,“讼师地棍,知官之势难兼顾也,放胆唆诬,互相剔剔,故案牍滋繁矣。”^⑦讼师、地棍广泛参与诉讼,唆使百姓进行诉讼,以及各种胥吏蠹役也趁机对百姓敲诈勒索,导致官民关系紧张。由此,可以看到沈氏任职时泰和地方社会的复杂和难治之情形。到任后,沈氏励精图治,“抑强除暴,精敏敢为,吏胥敛迹,尝清粮米陋弊。”^⑧除此,沈氏还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刚柔并济。“以除暴安良兴教善俗为己责,创建龙洲书院,置学田,立学规,暇日与诸生讲习,励以敦品。凡听讼,案无留狱。”^⑨

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沈氏采取了灵活的处断方法。如对于命案,在审理过程中便需要特别谨慎,亲自到案发现场查明原因,验明伤情。沈氏每次亲赴乡村勘查现场,都轻装简从,细致勘核,从速审断,避免案件拖累迁延。如果案件主犯逃脱,一时无法缉拿归案,便发布告示进行通缉。沈氏对轻生自尽等案,以及赌博等恶习,尤为痛恨^⑩。对于词讼案件,则从不随便拘押案犯,即使有不得不拘押候审者,也会从速处理。他听取证人证词,对诉讼双方分别教导后便予以释放。对于那些因拖欠税粮久不完纳而被拘押者,只要其及时补缴后便会立即释放^⑪。对于重刑囚犯,除严加防范外,还会给予相应人道关怀,保证囚犯的基本权利。如遇囚犯生病需要救治,则安排大夫用心诊治、发给药物,并嘱咐管狱典史对犯人细心照料^⑫。针对户婚田土等民事案件,则采取随到随审、随审随结的原则,让诉讼两造当堂画押,从不假手胥吏,防止再生事端。而对于命盗重案等刑事案件,则详细推敲,细致审理,并将已被拘押之与案件无关人员立即开释,以免造成不必要牵连。至于鼠牙雀角一类的民间细故,则在诉讼两造向县衙提交诉状时便立即审理清楚并当堂结案,甚至连人证都不需要传集,省去了不必要的诉讼程序,极大地降低了诉讼成本^⑬。

泰和乡村讼棍横行,唆使涉案之人进行无端诉讼,致使地方讼风深炽。沈衍庆对讼棍严厉打击,有

①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4页。

②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4页。

③ [清]崔国榜修,金益谦纂,同治《兴国县志》卷22《名宦》,同治十一年刻本。

④ [清]夏燮:《序》,沈衍庆:《槐卿遗稿》,第3页。

⑤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3页。

⑥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1页。

⑦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5页。

⑧ [清]宋瑛修,彭启瑞纂,光绪《泰和县志》卷5《政典·宦绩》,光绪四年刻本。

⑨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5页。

⑩ [清]沈衍庆:《覆吴中丞札飭办理命案及施七厘散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105页。

⑪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2页。

⑫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2页。

⑬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3页。

力地整治了讼棍唆讼问题。沈氏指出：

讼棍凶徒，最为民害。若不留心查拏，认真惩创，则姑息适足养奸，而良懦愈受扰累。职办理一切词讼，审系愚民无知，情有可原，概从宽恕。惟究出主唆讼棍，必箠拘到案，重则详办，轻则枷杖。或系柱挺立，隔旬提责一次。凶徒横行乡里，亦照此惩办。现在棍徒似稍知敛避，仍不时确加查访，按名拏究。^①

沈衍庆任泰和知县时，乡村抗粮欠赋之风甚炽，以致官府催科日紧。“泰邑各花户疲玩性成，视国课为无关紧要，不特上下忙延不完清，即历年旧欠银米，亦竟任催罔应，以致每年或请委员、或派家丁，分赴各都游征。”^②针对此种情形，沈氏一方面对乡村百姓进行劝谕，一方面请求朝廷减轻百姓赋税负担。先后颁布《清丈田赋》《谕各乡贤后裔清完钱粮》《催完钱粮告示》等系列文告，敦促乡村百姓及早完纳国课，如有故意拖欠必定严惩^③。虽然经过多次劝谕，但民间抗欠之风依然炽盛。为顺利完成赋税催征任务，沈衍庆亲自深入乡村查明积欠原因。其对泰和乡村百姓拖欠赋税原因作了深入剖析，指出：

近来疲敝情形，日甚一日，病根由于钱粮之积欠。详查积欠之故，缘民间风俗。买田者多不收粮，卖田者多不过户。买主贪图便宜，每年贴卖主费若干，谓之协纳钱，较自完之数差减。卖主利岁收协纳钱，随即花用，钱粮竟置不问。甚有田易数主，粮仍原户。岁月久远，子孙不知田亩坐落何处。此过割不清，产去粮存之病也。一家之粮，分作数户，或十数户。虑官挨查，止完一二户搪抵，余户狡不承认。^④

在沈衍庆看来，泰和县疲敝情形日益深重的根源在于钱粮之积欠，而这主要与乡村社会长期以来的田地买卖习惯密切关联。其一，买田者多不收粮，卖田者多不过户。买主因贪图便宜，只补贴卖主协纳钱若干，与应完纳税粮数额差距较大，而卖主收取协纳钱之后便不再管买主是否缴纳田赋。更有甚者，买主又将所买之田转卖他人，甚至出现一田数主的情况，而税粮却仍由原户缴纳。年深日久，子孙便无法知晓田地的位置，从而出现过割不清，以致田赋无人完纳，造成积欠。其二，基层行政区划设置的混乱，导致田主和田地分离，官府难以对田主进行有效稽查。而欠粮户积欠既多，为逃避官府的催缴，往往采取贿赂清查赋役的“册书”篡改图甲的方法，故意隐匿田产。其三，祠堂公业一类的粮业，没有固定纳税人，加之税粮征收数额及标准的不确定，致使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而这正是导致赋役不均、紊乱颠倒的重要原因^⑤。

再者，泰和县乡村宗族势力强大，差役不敢上门催征。即便下乡催征，差役因畏惧宗族势力，也不敢有多少实际征收行为。若强行拘拿欠粮之人，必定遭到宗族的强烈反抗，而各大乡村也会闻风效仿。一旦出现群体性的重大抗税事件，官府就会调兵弹压，如此则极易激起变故，从而引起官民之间的对抗，造成乡村社会的不稳定。其指出：

尤可恶者，旗丁籍口运费钱粮多不破白，以暨二都之固陂张姓，三都之灌溪匡姓，寺下萧姓等村，族最大，丁最繁，积欠钱漕动至盈千累万。差役不敢临门，官亲催征坐守，仅以一纸限状搪塞，或完些须了事。若带领差勇拘拿，则抗官殴差，拒捕夺犯，或男丁躲避，妇女泼抵。其次大村庄，亦多闻风效尤，将欲禀请调兵严惩，又恐激之生变。自蹈办理不善之咎，以故相率因循。^⑥

①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5-126页。

② [清]沈衍庆：《催完钱粮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60-361页。

③ [清]沈衍庆：《谕各乡贤后裔清完钱粮》，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50页。

④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1页。

⑤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1-92页。

⑥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3-94页。

沈衍庆认为,如果不清除赋役征收存在问题的根源,必然会生发出各种其他问题。如书吏、差役等会趁机侵蚀、科索、贿赂包庇,从而导致民间逃税、抗税等行为不断发生。县官迫于完纳期限之压力,便不得不亲自下乡催征,但限于人力和地理范围广阔等因素,又必定委派衙门其他人员代为催征,由此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百姓的层层盘剥和骚扰,进而造成地方百姓相互观望。即使有自愿完纳税粮者,也必然会被其他人所阻止,这样会对赋税征收造成很不利的影响^①。为有效解决乡村宗族干扰赋税催征的问题,沈氏在下乡催征时亲自召集绅士耆民宣讲《圣谕广训》,试图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劝谕其积极完纳税粮。同时,分晰都图赋役黄册,清查赋役拖欠数目,严厉打击图役蒙混等行为。再者,严厉打击以欠粮为能的健抗顽户、刁生劣监,并严禁差役骚扰^②。

赋税积欠是困扰地方官施政的重要问题,极易引发纠纷和诉讼,成为传统时代乡村治理的难点所在。沈衍庆自任泰和知县以来,所审理案件中属赋税积欠之案最难审结,而频繁地下乡催征又必然耽误其他案件审理。对此,沈氏深有感触地说道:

计职到任以来,上控自理新旧各案已审结百数十起,其久未呈催者,即照例注销,现在呈词较前减少。惟是卑县钱粮积欠最巨,春秋两税,必印官亲催,一或不到,即互相观望,抗不完纳。地方辽阔,逐图催征,有需时日。故一岁之中,在乡日多,在署日少,以致未讯各案不能不留牒以待。曾仿照《图民录》所载,带卷下乡,就便传审,而头绪太繁。时势迫促,实难一律兼顾,政拙而心徒劳,殊滋戚戚。^③

在地方官府忙于赋税催征之时,讼师地棍往往趁隙唆讼,致使聚讼纷纭。衙役蠹吏也趁机敲诈勒索、隐匿案情,致使百姓冤屈无法及时伸张,官民之间矛盾加深。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赋役制度的逐渐崩坏与基层行政制度设计存在弊病。对此,沈氏有着清晰的认识:

而且讼师、地棍知官之势难兼顾也,放胆唆诬,互相别鬻,故案牒滋繁矣。猾吏蠹差恃官之万难久任也,乘间舞文,逞权匿案,故事多沉阔矣。良懦抱屈,待质需时则拖久,而怨讟沸腾矣。坟山地界,履勘无暇,则争斗起而酿成命案矣。官与民为仇讎,敲扑拘追,几无虚日。民视官如过客,条教号令,漠若罔闻。且夫催科抚字,功实相因。抚字弗尽其道,固难徒事催科,而催科未举其纲,亦岂能空谈抚字。^④

面对泰和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难题,沈氏认为首先必须努力完成赋税的征收,而这又需要做到正本清源,即清丈田亩。只有厘清田亩,进而明确各田亩征收之税额,才能解决由此引发的诉讼问题。

刑名和钱粮征收是地方官施政所需要突破的核心问题,税粮积欠特别容易引发纠纷和诉讼^⑤。同时,地方百姓积欠税粮又必然影响朝廷赋税征收,对国家财政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如何有效清理民间积欠、按时完纳国课便成为地方官尤为关心的问题。从沈衍庆在泰和知县任上所遇之赋税催征问题可以看到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复杂性,而其中又往往牵涉衙役、书吏、胥吏等各类人员的勒索盘剥和腐败行为,以及地方宗族的抵制和对抗。此外,沈氏还必须有效处理各类纠纷与诉讼,并保证处断的公平,以维护和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这不仅涉及其自身的考绩,更事关国家大计,尤其是对刑名和钱粮问题严重的江西地方来说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正如沈衍庆所言,“惟愿尔等早完国课,各保恒心,作盛世之良民,省讼狱之烦扰,本县不胜欣幸之至。”^⑥沈氏在兴国、安义、泰和及鄱阳知县任上审理了大量民事、刑

① [清]沈衍庆:《覆署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2-93页。

②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4-125页。

③ [清]沈衍庆:《覆吉安李太守谕行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4《书牍二》,第123-124页。

④ [清]沈衍庆:《覆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载其著《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95页。

⑤ 如《槐卿政绩·判牍》所载之《飞粮过户事》《瞒产陷赋事》《藐法匿税事》便是典型的由隐匿田亩逃税所引起的诉讼。

⑥ [清]沈衍庆:《止送牌匾伞轴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87页。

事纠纷与诉讼案件,如其所辑之《槐卿政绩》收录的153件判牍,包括人命、斗殴、田宅、婚姻、继承、宗族、钱债等各方面讼案,展现出乡村社会治理的复杂情态。

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在南昌知府王藩的推荐下,沈衍庆出任鄱阳知县。“鄱阳剧邑,号难治。”^①沈氏上任后,因革利弊,移风易俗,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治理。关于沈衍庆在鄱阳的治行,其姻亲,曾任江苏同里候选训导的陈兰有过叙述。“既莅任,兴利除害,不留狱,诸政如泰和。拓芝阳书院,以育合郡人才,规模尤壮。广育婴堂,修养济院,施药饵,散棉袄,以恤生者。给棺木,置义塚,以哀死者。”^②在鄱阳知县任上,沈氏遭遇了两次严重大水,其施政面临严峻考验。

三、水灾治理与乡村社会救济

鄱阳县在清代隶属于饶州府,濒临鄱阳湖,在夏季雨水暴涨之时极易发生水灾。沈衍庆任鄱阳知县期间,共发生过两次严重大水,分别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二十九年(1849),这两次大水对乡村社会都造成了深重灾难。据同治《鄱阳县志》载:

方己酉仲夏,鄱水之暴涨也。霖雨连旬,水势较戊申高三尺余,兼之烈风时发,波涛汹涌。郡城惟西北门逼枕芝山,其余俱成巨浸。沿河一带房屋漂没,仅有存者亦坏柱颓垣,大半残缺。城内外街巷水深丈余,即高垣崇阁亦弥漫。排楼窗而上,揭瓦毁檐方能登舟逃命。始而尚有城头陂阜及坟丛高处可盖棚栖止,至是一徙再徙,几于立足无地。或水宿风栖,苟延旦夕。或抱木攀筏,随浪浮沉,水乡村舍往往排架连楹,顺流而下。但闻男妇号泣,呼救之声与风声水声相嘈杂,惨目伤心,不堪言状。^③

这段记述生动地描绘出大水冲击鄱阳县的场景,反映出大水的破坏力和对地方百姓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道光二十八年大水比二十四年水高三尺余,水势甚大,破坏力强,持续时间长,沿河房屋尽被淹没,只剩下残垣断壁,城内外街巷积水甚深。百姓无处栖身,到处是哭泣呼救之声,与风声水声相互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幅惨烈的水灾图景。大水过处,低乡地带的农作物也全部被水冲毁,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如同治《鄱阳县志》记述,“天河忽倾泻,万派波腾翻,苍黄共一色。势欲浮乾坤,鄱江三百里,荡刷无完村。”^④从中可见其水势之大,鄱阳湖三百里附近村庄皆被水淹没无存,其悲惨景象难以名状。

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又比二十八年更加剧烈。“二十九年大水,较二十八年又大三尺余。低乡水浸屋檐,砖墙多圯,并有连屋为水漂没者。城厢内外居民率登楼避水,累日不能举火。”^⑤对于大水造成的惨状,沈衍庆在向上级的灾情汇报中作了详细描述:

自五月下旬以来,大雨时行,河水盛涨,前将田禾被淹及水势日长情形,业已三次驰禀,宪鉴在案。今自七月初四日起至二十日止,淫雨八日,东南风大作,风狂浪涌,每日长四五寸。前此被水本重,今又骤添新涨,以致郡城内外一片汪洋。不特乡圩倒塌,田屋皆在水中,甚至城内街衢概成巨浸。各铺户居民纷纷迁避,荡析离居,深堪悯恻。亲诣各处查勘,沿河房屋冲塌甚多。兼有饶郡便兑之浮梁、乐平、德兴、万年四县,水次漕仓坐落,隔河对岸俱已倒塌。附近居民稍有力者,先俱搬避逃生,内有无力贫民不能搬移者,水已封门,尚蹲栖屋架,饥饿待毙,一经

① [清]曾国藩修,刘绎纂,光绪《江西通志》卷132《宦绩录十二》,光绪七年刻本。

②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5-286页。

③ [清]刘春晖:《鄱阳大水图记》,[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16《艺文志一》,同治十年刻本。

④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19《艺文志四》,同治十年刻本。

⑤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21《杂志一》,同治十年刻本。

倒塌,悉付洪流。困苦情形,痛心蒿目。^①

大水造成的严重灾难是房屋被毁,地方百姓困苦流离、无处栖身,田地被水淹没,农作物绝收,粮食无法接济。此外,由于水势太大,房屋倒塌,极苦贫民衣食无着,只能饥饿待毙,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当时传唱的一首采榆歌谣生动地描述出遭受水灾后的悲惨场景。

儿采榆,爷行踟躅,母泣途。榆高百尺,手无具来,迟却被人先据,嗟哉!教儿采何处。

道旁别未语,先教气呜咽。鸠形但剥,风中肤柔情,不共饥肠枯,嗟哉!别泪何时无。^②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水灾情,身为鄱阳知县的沈衍庆积极开展水灾救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救灾措施。沈氏亲临水灾一线勘察灾情,安置、赈济受灾百姓。据同治《鄱阳县志》记述:

二十八年大水,沿江民舍为冲波漂荡,俱蹲楼角,若饿鸱。每大风作,则呼救之声四起,衍庆择高阜结棚俾徙居焉。其不能徙者,则作饼饵,棹小艇亲散之。城中四门分设粥厂以济饥,布置周密,吏胥不能为奸。衣忘澣食忘饱,日必乘舟而抚循之。冒险上下,风涛震骇,了无惧色。一面上书请赈,不避忌讳。至再至三,必得请乃已。二十九年又大水,更增数尺。衍庆勘灾督赈,劳苦倍加,前后所活计数十万口,以治行称江西最。^③

为应对水灾灾情,沈衍庆一面亲自指挥布置抗灾救灾工作,为百姓分发赈灾粮食,在城中四门设置粥厂施粥赈济,每日必亲临救灾一线严加督促。同时,向上司饶州知府请求拨给赈济钱粮,为受灾百姓争取救济和抚恤,并向邻县发布告谕招商贩运送粮食前来接济灾民。为全力做好水灾防治和灾民救济,沈氏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发布《水灾谕息讼告示》,在救灾期间只接受命盗重案的诉讼,其余口角、户婚田土一类细故应以调处解决争端^④。在勘灾赈济过程中,沈衍庆筹划周详,通过一系列严密周到的布置和防范措施,使赈灾工作落到实处而又真正惠及灾民。其救灾措施包括:发给抚恤钱文、施粥施衣、缓征与捐输并用、以工代赈等。鄱阳县广大的乡村地区受灾严重,沈衍庆非常忧心受灾百姓的生存和日常生活问题,根据受灾乡村地区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救济对策。

其一,对于受灾之乡村地区,沈衍庆发动各村绅耆各自按照都图挨户查明丁数,限时登记造册,再由官府派员逐一按照都图为单位进行复查,先发给丁口票,再换成领赈钱票,由串票式委员设局分示给领。针对那些无力搬移之家,沈氏为之选择高处之地暂居,搭盖蓬厂,捐给搬费,分别迁徙安置。同时,晓谕乡村百姓各安乡井,听候抚恤,切勿轻易离开家乡逃荒他处。沈衍庆在赈济乡村百姓、开展乡村社会救济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发挥绅耆的作用,绅耆属于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是沟通地方官府与乡村百姓的桥梁。沈氏委派各村公正绅耆,将府县有关救灾指示传达到乡村,并让贫苦乏食之受灾百姓在府县派员巡视乡村时,各自按照家中男妇大小丁口在门首齐集,听候查点,并与绅耆核对上报之人数。待点明人数后,令该户家长在巡视人员所携带之刊刷简明丁口呈式内当场据实填注相关信息。一面填写底册核对,并大写灾户姓名条,记实贴在门柱上以便指认^⑤。如此,便可按照受灾之实际情形据实发给抚恤钱粮,使受灾百姓能够切实得到救济。

其二,对于水退较晚且不能补种莱麦杂粮之地,沈衍庆一面向朝廷请求援助拨给春酌籽种作为接济。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是解决乡村受灾百姓困境的有效方法,为此沈氏积极向各方筹措相关籽种和稻

① [清]沈衍庆:《请捐赈抚恤灾黎上各宪书》,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17《艺文志二》,同治十年刻本。

② [清]李国珣:《己丙之间鄱民饥儿采榆道旁别》,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19《艺文志四》,同治十年刻本。

③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职官志》,同治十年刻本。

④ [清]沈衍庆:《水灾谕息讼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76-377页。

⑤ [清]沈衍庆:《覆首府邓太守论办理抚恤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第153-154页。

谷。同时,又劝谕殷富之家踊跃捐输,以帮助贫苦灾民购买籽种渡过冬春难关^①。对于那些主动慷慨捐资之绅士,沈衍庆也会作诗赠之以作为对其善行的回馈和肯定。如同治《饶州府志》记述,“廉家植,字苍林,鄱阳人。道光己酉水灾,邑令沈衍庆勘灾至廉村,植愿输谷数百石以助,乡人赖以全活,沈作《勘灾吟》赠之。至岁修桥梁道路及协助里人婚嫁丧葬,俱无吝色。”^②廉家植的捐助美德得到知县的赞赏,更加激发了其捐输的热情。沈氏的这一举动使乡村绅士阶层能够主动参与到水灾救济当中来,对推动乡村社会水灾治理和救济具有重要意义。

其三,拨给钱费予贫苦无力之灾民修筑圩堤帮助其恢复生产。由于受到大水侵袭,各圩被冲破,无力抵挡洪水。沈衍庆向本地绅耆详加采访查明情况,大张告示劝令,按田派修,严厉督促,令有力之家务必尽快自行修复圩堤。对于确实无力修复堤圩之贫民,沈氏先拨付接济钱粮以作修圩之用,并实行以工代赈的方法帮助其维持生产生活^③。为保证修圩费用的正当使用,沈氏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发布《严禁修圩浮冒偷减事》告示,严禁不肖圩保、地棍串通劣绅冒领侵蚀分肥圩费。为此,沈氏派员将各圩应修丈尺逐一核对,按照取土远近分别给予不同数量之修圩费用。为确保修圩之事能顺利完成,沈氏对于敢冒领圩费、偷工减料、修筑不坚固,以及不法棍徒籍端生事者进行严厉打击,从而使受灾乡村之贫民能够有序修复堤圩^④。

对于沈衍庆在鄱阳赈恤灾民及乡村救济的做法,林则徐对此高度赞赏。“鄱阳灾最重,而振民最勤,不为成例所束缚,良法美意常出于功令之外,民爱之若父母焉。”^⑤为感念沈氏救济灾民之恩情,鄱阳士民提出建亭立碑传颂其美德之提议^⑥。咸丰建元(1851)辛亥正月,福建汀漳龙道桂超万从福建归来路过南昌,停船于滕王阁下,微服采听风谣,坊市所流传的皆是沈衍庆抚鄱之惠政。“闻鄱邑循声洋溢街巷,赈务实惠,政事实心,且教令之词,讼狱之判,救灾请命之语,与学训士之文,一一脍炙人口,群以抚臣、学臣交章荐举为得贤,是真以经术饰治者也。”^⑦从中可见鄱阳百姓及士人对沈衍庆抚鄱的称颂与感念,也从侧面反映出作为地方父母官的沈氏之勤政爱民。

四、保甲、乡约与乡村社会秩序管控

盗贼问题是影响清中晚期江西乡村社会治安的最直接因素,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地方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盗贼也趁势而起。沈衍庆在鄱阳知县任上,以保甲和乡约相结合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地防治盗贼,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鄱阳县濒临鄱阳湖,湖区盗贼滋生,经常抢掠行人及过往客商,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同治《鄱阳县志》描述其时邑内之盗贼情形,“鄱邑素滨湖,盗出没其间,行者多戒。”^⑧鄱阳湖成为盗贼之渊薮,为行舟畏途,舟船不敢在鄱阳湖上行走。为改善鄱阳湖区社会治安,沈衍庆“添置巡船,派健役梭织其中,屡获巨盗,严治之,水路肃然。”^⑨为有效肃清盗贼,又“编渔户名册,仿保甲法行之。屡获巨盗,置诸法,不半年而盗绝。”^⑩道光二十八年(1848)六月,沈衍庆颁布《弥匪章程告示》,仿照保甲法来推行其弥盗

① [清]沈衍庆:《覆首府邓太守论办理抚恤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第157页。

② [清]锡德修,石景芬纂,同治《饶州府志》卷23《人物志六》,同治十一年刻本。

③ [清]沈衍庆:《覆首府邓太守论办理抚恤事宜书》,载其著《槐卿遗稿》,第158-159页。

④ [清]沈衍庆:《严禁修圩浮冒偷减事》,载其著《槐卿政绩》,第373-374页。

⑤ [清]林则徐:《附官保覆书》,沈衍庆:《槐卿遗稿》卷3《书牍一》,第88-89页。

⑥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名宦》,同治十年刻本。

⑦ [清]桂超万:《序》,沈衍庆:《槐卿遗稿》,第4页。

⑧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职官志》,同治十年刻本。

⑨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6页。

⑩ [清]曾国藩修,刘绎纂,光绪《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宦绩录十》,光绪七年刻本。

措施。沈氏认为,要肃清鄱阳湖区域的盗贼,捕役侦缉得力固然重要,但乡村约保各自严密稽查更为关键。希图通过乡约和保甲的严密监督,实现官府和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使盗贼无处藏身,从而达到安靖地方的目的。如其所言:

照得鄱邑地方辽阔,贼匪易于混迹,弥匪之术固须捕役侦缉得力,尤在各村约保各自严密稽查。如本村有窃贼行窝匪徒,立时指名禀究。或实有赃,据公同捆送。倘有外来流匪行迹可疑,即行驱逐出境,毋许混迹囤留。俾宵小不能潜迹,地方自可安静。除飭差严缉外,合行开列条款,分晰示谕。为此示仰各村军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特示。^①

沈衍庆在《弥匪章程告示》中制定了六条监视、缉捕盗匪的具体措施,基本做法如下:

一、失主及约保邻佑人等,如遇贼匪,有能捕获送县者,准其喊禀,不必具呈,立予审讯。但不许挟嫌妄扳,违者照例治罪。若强贼拒捕,登时格伤者勿论。

二、各村内如有容留贼盗之窝家,许邻佑约保指名禀县拘案审究,审实给赏。若知情容隐不举及挟嫌妄禀,察出一并治罪。

三、各村饭店设立号簿,注明来踪去迹,随时稽查。如敢容留贼匪,许该约保指名禀究,容隐妄扳,照例治罪。

四、遇他处匪徒潜入境内,无论有无抢窝生事,许村约保协力驱逐。但经缙窃得赃,即准擒拏送县喊禀,立即审究,审实给赏。

五、各村内遇有外来年壮恶丐恃众强讨,无论老幼男妇,立即驱逐出境。丐等倘敢撒赖,准其扭送究惩。如系本地丐人及老幼孤寡央求乞食,则宜调恤,不在此例。

六、贼犯供出买赃之人,如系贫贱误买,许将原赃自行缴案,免其深究。倘系积惯窝家,及知情买受代贼销赃者,仍按名拏究。^②

从上述章程可以看到,沈氏将保甲与乡约有机结合,建构了一套以防治盗贼为核心的乡村治理体系,对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从此,湖区盗贼对沈衍庆十分敬畏,“咸曰:沈老子境内,勿犯。”^③沈氏治理湖区盗贼的做法及成效也获得鄱阳地方百姓的称颂。“由是,民无不以沈老子称之。”^④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皇帝继位,下诏广求贤才。在江西巡抚费开绶、学使张芾的荐举之下,沈衍庆以“治行江西第一”于咸丰元年(1851)赴京入觐皇帝,地方官员对此交相称道^⑤。其时,知州衙署江西新昌县知县蒋予检记述了这一情形。“众以微员得荷九重垂询,一时传为盛事。”^⑥沈氏回任鄱阳知县,百姓欣喜异常,“民如重获慈母,闾巷相庆”^⑦“万民夹道以迎”^⑧。由此可见,沈衍庆之惠民实政获得了巡抚、地方官员和百姓的认同与支持。

沈衍庆所处时代正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的侵袭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为抵御太平军,地方督抚先后上奏朝廷请求兴办团练,获得允准,飭令各州县悉心筹办。由于太平军持续逼近江西边界,为保境安民,江西各州县地方官纷纷组织兴办团练。沈氏奉上司江西巡抚之命,在鄱阳县奋力兴办团练,“查保甲,选壮勇,制器械,逐日训练。”^⑨并将《敏果斋丛书》《乡守外编节要》两书合并刊

① [清]沈衍庆:《弥匪章程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66-367页。

② [清]沈衍庆:《弥匪章程告示》,载其著《槐卿政绩》卷1《示谕》,第366-369页。

③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4页。

④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4页。

⑤ [清]钱仪吉、缪荃孙、闵尔昌等:《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2页。

⑥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4页。

⑦ [清]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9,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本。

⑧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7页。

⑨ [清]沈衍庆:《槐卿遗稿》卷6《杂著·敏果斋丛书乡守外编节要合刊序》,第226页。

发,晓谕各乡村遵照筹备。沈氏不仅招募本县乡勇,还征募本宗族成员二百余人加入团练,并亲自组织训练。对于沈氏在鄱阳兴办团练的动因及其做法,陈兰有记述:

比年,粤匪骚动,君慨然曰:“上不能为国分忧,下不能为民保命,朝廷何赖此臣子乎?”于是倾囊为倡,劝殷富捐团练费,刊《乡守备要》一册,遍示居民。编十家牌,置器械,造战舸,选丁壮而训之。日一大阅,赏罚必信,鄱勇遂称最章江。^①

沈衍庆利用保甲和乡约相结合的方法,寓兵于农,拣选丁壮民兵作为团练乡勇进行严格训练,为抗击太平军准备了有生力量。沈氏在《贺县团练条规》中明确阐述了保甲的具体做法:

今本县历各乡举行保甲、团练、乡约之法,要在简而易行,使尔等乐于从事,易于办理。其法每村设立约长、甲长,大村七八人,中村五六人,小村二三人,孤村则归入附近大村之中办理。该约长等订纸簿一本,开明本村一户某人某处人、作某生理、祖父某名、伯叔某名、子侄某名、孙某名、雇工人某名,不分土客,不论良歹,不拘单身孤寡,一齐照式开列簿中。于一村共信之好人,则注“公保”二字。其素不安分、形迹可疑之人,则不注“公保”二字,详细造齐持送公所。本县逐一查阅,算计某村若干家,即面给门牌若干张交与约长,分给各家张挂,其簿内未注明共保者,本县存记在心,另为稽查办理。^②

从上可见,沈衍庆所行之保甲法主要是以约长管理和稽查乡村百姓,防止不安分和形迹可疑之人混入乡村。同时,沈氏还以约长来管理团练之事。如其所言:

本县设立议团之法,通县十八里中相度形势,或十余村为一团,或数十村为一团,每团设立约长管理团练之事。其团内大小村寨各设极高望楼一座,大村二三楼,中村一二楼,小村一楼,孤村则附入大村办理。每村轮派二人击梆巡查,望楼之上安设地雷炮三个,强盗入村放炮三声,邻村及塘汛一闻炮响,即刻放炮接应,村中各家闻炮齐起,执器械出村围截。^③

沈衍庆所行之团练法,以村为团的基本单位,并由约长统领,守望相助,防止盗贼侵袭。“乡守之法,保甲以清内盗,团练以御外贼也。”^④沈氏以保甲、乡约和团练构筑起乡村社会的防御体系。此外,沈氏还借鉴于成龙《畿辅弥盗条约》的做法推行以保长统属各甲长之法,使各村庄纳入到官府的统辖之内,以便有效提升各村庄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

沈衍庆任鄱阳知县时正值太平军攻打南昌府城及其所属州县,在江西巡抚张芾檄令的调遣下,沈氏率团练参加了抗击太平军的战斗。抗击太平军是这一时期清廷和地方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清代晚期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遭遇的难题。作为朝廷命官,沈衍庆积极响应上司的号令,率乡勇前往南昌府城支援。因太平军趁机偷袭鄱阳县,沈氏又率军回援,与时任代理知县的乐平县令李仁元共同与之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力战身死。其实,在太平军尚未进攻鄱阳之前,沈氏便“以旧服钤印书名,以示必死”^⑤,并自撰联曰:“四十年读书,二十年服官,取义成仁,要担起纲常两字。进难为力战,退难为固守,孤忠效死,愁对兹章贡双流。”^⑥从中可见其身清廷官员所展现的守土之责和忠烈之心。

由于太平军进击湖南逼近江西边界,湖北戒严,九江与湖北毗邻,为江西和湖北之门户,上饶与九江

①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7页。

② [清]沈衍庆:《贺县团练条规·保甲》,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四十九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页。

③ [清]沈衍庆:《贺县团练条规·团练》,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四十九册,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13-114页。

④ [清]沈衍庆:《乡守外编节要》卷一,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四十九册,第127页。

⑤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6页。

⑥ [清]蒋予检:《赠观察沈公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76页。

也是唇齿相依,太平军攻打鄱阳也是迟早之事。为此沈氏提前做好了与太平军接战的准备,故而早已下定力战必死之决心。沈氏的忠义还与其一直以来对乡贤金声(字正希)、吴应箕(字次尾)遗风的仰慕有着密切关联,这两位都是明末清初安徽池州的忠义之士。故而,沈氏“每怀乡先生金正希、吴次尾之遗风,不禁拔剑欲起。以故援救省城,益以取义成仁,担荷纲常自励。”^①

沈氏战死后,时任江西巡抚张芾第一时间向朝廷上奏请求对其进行抚恤褒奖。沈氏也因此事迹而被朝廷褒扬,“加赠道衔,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依照千总例发给抚恤银一百五十两由其子具领”^②,并在鄱阳专门为其建祠致祭。地方士民纷纷作殉难歌以纪念其抚鄱之功,如李郁华《沈李二公殉难歌》,其歌曰:“知有仁义不知利,惟古忠臣尽循吏。颜范一去千余年,后来守令难为继。猗嗟!沈侯抚鄱,民已饥已溺,如其仁,天将磐错显奇节。水灾甫澹兵灾新,围城战罢归防堵。旧令新令结肺腑,生与同官死同城。赫赫双忠照千古,无城与守兵无多。两公节概高嵯峨,不斗身强斗捷足,奈汝纷纷将士何?”^③彰显出地方士民对于沈氏救济灾民和保全百姓的感戴。其余如长沙孙麟趾《哭鄱阳殉难沈李二公》、举人王景蓉《沈公勘灾图》、方晴溪《题沈槐卿明府鄱阳纪事图新乐府七首》等^④,大体都是表达对沈衍庆抚鄱期间惠政的感恩之情。光绪四年,江西巡抚刘秉璋上奏朝廷请求为沈衍庆赐赠谥号并由史馆立传^⑤,获得朝廷允准。批复公文称:“该故员等治行称最,遗爱在民,力守县城,死事惨烈。该县绅民呈请奏恳恩施等语,著照所请,将该故员等事实,宣付国史馆,编入《循吏列传》,以彰忠尽而顺輿情。”^⑥后沈氏事迹又被载入《清史稿·忠义传》^⑦。从上可见,沈氏力战太平军身死,这一行为获得了清廷、江西巡抚和地方士民的肯定与褒扬,被视为保境安民、守土御敌的“忠义勇士”。

清代乡村社会的宗族矛盾和风俗教化问题,也是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鄱阳地方宗族发达,械斗频发。据光绪《江西通志》记述,“邑俗强悍好斗,或聚族党千百人相仇杀。”^⑧又据该志记述,有一次,沈氏得知有宗族即将发生械斗,遂“轻骑驰往,为剖是非,析利害,其事遂平”^⑨,成功地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沈氏处理宗族问题主要以礼仪教化为主,在遵循朝廷法度的基础上,晓之以大义,“竭诚开导”^⑩。据闵尔昌《碑传集补》记述,咸丰二年(1852)六月,李仁元到乐平担任知县之职,路过鄱阳拜会沈衍庆,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约为兄弟,饮三日别而去”^⑪。到任时正有宗族准备械斗,李仁元无法有效处理,沈衍庆亲自前往才得到有效解决。如该书所记,“(笔者按:李仁元)到县,县小好斗,有四族世相仇讎,动结千人,约期会战,如敌国。仁元劝治不听,刀矛方交。(笔者按:沈衍庆)乃独驰马横两众前,众大惊,又感悟,罢去。终仁元在官,不复斗杀。”^⑫从中可见沈衍庆处理宗族纠纷的能力之超群。凡是涉及宗族之间山林、田地、坟山及宗祧伦理等纠纷与诉讼,沈氏都会亲自下乡踏勘查明实际情形,在遵循朝廷法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情、理等因素审慎处断。由于沈氏个人的智慧及控制,在其任鄱阳知县期间,邑内始终没有发生过宗族械斗事件。在社会风俗移易方面,沈衍庆严厉禁止淫祀,

① 刘锦藻撰:《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65《经籍考九》,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② [清]张芾:《前江西抚宪续奏殉难诸员优恤折》,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67页。

③ [清]李郁华:《沈李二公殉难歌》,[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名宦》,同治十年刻本。

④ [清]陈志培修,王廷鉴等纂,同治《鄱阳县志》卷5《名宦》,同治十年刻本。

⑤ [清]吴坤、沈葆楨修,何绍基、杨沂孙纂,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补遗一《人物志》,光绪四年刻本。

⑥ [清]《清实录》卷六十三《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上。

⑦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91列传278《忠义五》,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9134页。

⑧ [清]曾国藩修、刘绎纂,光绪《江西通志》卷132《宦绩录十二》,光绪七年刻本。

⑨ [清]曾国藩修、刘绎纂,光绪《江西通志》卷132《宦绩录十二》,光绪七年刻本。

⑩ [清]曾国藩修、刘绎纂,光绪《江西通志》卷132《宦绩录十二》,光绪七年刻本。

⑪ 闵尔昌撰:《碑传集补》卷31《忠节一》,1923年排印本。

⑫ 闵尔昌撰:《碑传集补》卷31《忠节一》,1923年排印本。

防止其迷惑百姓。“鄱民吴春妻为五通所凭,歌哭嬉笑无常。有巫迎木偶至其家,驱五通去,远近传为灵异。饰以锦袍,輶帟乘舆游街,鼓吹喧嚷,男女膜拜。君谕禁,不止。乃锁木偶杖之,付之烈炬。”^①沈衍庆清除了扰乱社会风俗的邪神祭祀。同时,严厉惩治赌博,净化乡村社会风气。如鄱阳县“乡隅之不逞者,每设场聚赌,衍庆侦知之,辄亲往焚其厂,且重惩之,而赌风顿戢。”^②

结 语

从沈衍庆在江西地方知县任内的施政,可以看到其地方治理实践及方略。作为地方知县,其所处理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理论催科,治理水灾,开展社会救济,防治盗贼,移风易俗,教化地方,展现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面貌。这不仅是清代江西乡村社会治理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其时整个清代地方政府所要应对的普遍性问题。从兴国、泰和到鄱阳施政重心的变化,反映出沈衍庆善于体察民情和社会形势变化,关注民生,关心百姓疾苦,亲民、爱民的理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其在审理讼案、催收钱粮、处理宗族问题、救济灾民等事务时都特别注重以民为本,将情、理与法相互融合,注重道德教化,以德化民。无疑,作为地方知县,沈衍庆可谓是一位亲民官。然而,沈氏所处道光、咸丰年间这一特殊的时代,因太平天国动乱,他还必须肩负起保境安民的责任。因此,沈氏积极组织团练,训练乡勇,抵御太平军进攻。沈氏治理地方,重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不论是治理鄱阳湖区盗贼,还是组织兴办团练,其尤为重视发挥乡约和保甲的基本功能。这是其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之一。

沈衍庆自进士及第、以知县分发江西,及至二任鄱阳知县,这一时期正是清代社会从中期向晚期转变的阶段,剧烈的社会变迁使地方治理的内容出现新的复杂的变化。作为地方知县,他不仅要处理地方社会的基本问题,还必须要应对内忧外患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西方的侵略也使沈氏异常忧心国家、社会与民族的安危,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毅然呈文于江西巡抚痛陈英国的侵略祸心和割地赔款之屈辱,请求朝廷慎与英国议和,而要尽早筹划抵御之策,展现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沈衍庆处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变局背景之下,外部的侵略骤至和内部的忧患丛生,使其更加关注社会和时局的变化,其为政也开始转向以抵御外国侵略和抗击太平军为主,担负起保家卫国和挽救清王朝命运的重任,其社会治理的任务也随之与整个清王朝的治理任务交织在一起,而这已经超越了其作为知县的职责范围。这是时代大变局赋予其社会治理的新内容,也折射出个人、区域历史与整体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地方知县,沈衍庆可谓尽职尽责,其以经术治政,怀抱着传统士大夫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忠君爱民,心系国家和民族,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其在江西地方的治理经验对当今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地方官员必须要深入基层体察民情,重视实地调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将制定政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同时,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关注民生,重视和解决民生问题。再者,基层纠纷的解决,尤其是讼案的处断需要将法律与情、理等因素相结合,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清]陈兰:《赠观察沈君家传》,沈衍庆:《槐卿遗稿·附录》,第286页。

② [清]锡德修、石景芬纂,同治《饶州府志》卷13《职官志五·名宦下》,同治十一年刻本。